

名著名译

日瓦戈医生

【苏】帕斯捷尔纳克 著

力冈 冀刚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名著名译

日瓦戈医生

【苏】帕斯捷尔纳克 著

力冈 冀刚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瓦戈医生 / (苏)帕斯捷尔纳克(Pasternak, Boris)著; 力冈, 冀刚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5339-3045-5

I. ①日… II. ①帕…②力…③冀…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1562 号

责任编辑 王晓乐

装帧设计 唐 筠

日瓦戈医生

[苏]帕斯捷尔纳克 著

力冈 冀刚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制版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483 千

印张 19.875

插页 8

版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045-5

定价 48.00 元(精)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

他才华横溢，命运曲折。朋辈的受难和自身的经历在他心中引起久远的悲哀和深沉的痛苦，使他对时代生活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以旁观、远察、静思的眼光去考察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1958年10月23日，作家由于“在现代抒情诗和俄罗斯伟大叙事诗传统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被授予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此事在当时苏联国内引起强烈反感，《日瓦戈医生》遭到批判，作家被开除出作协，他只得拒绝接受奖金。



力冈 (1926—1997)

原名王桂荣，山东广饶人。安徽师范大学教授。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再次受到冲击。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翻译文学作品和传记达七百多万字。主要译作有：《白轮船》、《日瓦戈医生》（合译）和格罗斯曼的巨著《风雨人生》等。1985年开始，力冈转向古典名著的重译工作，先后译出《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猎人笔记》、《当代英雄》和《上尉的女儿》等。他的译笔清新传神，富有境界和美感。作家张承志读了他译的《查密莉娅》后说：“我恨不得将其倒背如流。”翻译家杨武能称他“以一系列名著佳译，为自己树立了一座不朽的、高大宏伟的纪念碑”。



冀刚

原名王冀刚，1930年10月生，河北霸州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一直从事俄语教学与研究、文学和社科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受中国翻译协会表彰的“中国资深翻译家”。主要译作有：《雨果》、《马克·吐温》、《处女地》、《日瓦戈医生》（合译）等；主编《俄语前置词用法词典》等。他的译笔流利畅达，意蕴深长。

译本前言

反思历史 呼唤人性

薛君智

1958年10月23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日瓦戈医生》的作者——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从这以后，在苏联和西方之间展开了一场冷战，形成所谓“帕斯捷尔纳克事件”。

早在1948年，帕斯捷尔纳克就动笔写作《日瓦戈医生》，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进度很慢。1954年，《旗》杂志第四期刊出了尤利·日瓦戈的诗二十首，并登出作者附言，声明：小说《日瓦戈医生》可能在1954年夏天完成，它的故事包括1903年至1929年阶段，其尾声则写到卫国战争时期。附言说：日瓦戈医生是一个探索真理、善于思考的人，并且爱好创作和艺术，死于1929年，这十首诗被发现于他的遗物中，将作为小说的最后一章。事实上，小说完成于1955年至1956年冬。帕斯捷尔纳克将书稿送给了《新世界》杂志主编西蒙诺夫、《旗》杂志主编科热夫尼柯夫和国家文学出版社。在此之前，1956年3月间，

来到莫斯科电台工作的意大利共产党员记者安杰利奥早已注意到这部小说,通过他的周旋,帕斯捷尔纳克于同年6月间和意大利共产党员出版商菲尔特里涅利签订了合同,允许后者以各种文字出版小说(但应该在苏联本国出版之后,并不允许改拍、改编,不允许出版作家的其他作品)。在当时苏联政治形势似乎比较宽松的情况下,作家原以为小说是可以先在国内出版的。1956年9月,《新世界》编委们给帕斯捷尔纳克复信指出,由于小说对于俄国知识分子中大部分人和人民一起投身革命的问题作出了否定的回答,因此该杂志不可能刊出小说。这时,苏联当局得知意大利出版商手中已另有小说的原稿,党中央文化部便指示国家文学出版局建议帕斯捷尔纳克修改小说。作家同意进行商榷,但1958年初作家重病多月,事情拖延了下来。在此期间,苏联作家协会利用苏、意诗人晤谈的机会,并通过苏联驻意大利使馆及意共领导人的协助,多方劝说菲尔特里涅利延期出版此书。同时,还说服帕斯捷尔纳克给菲尔特里涅利写信,以小说需作修改为理由索回原稿。但据说,出版商同时也收到了作家让意大利记者转给他的条子,请后者自己作出决定。于是,在几次延期之后,1957年11月,《日瓦戈医生》的意大利文译本在米兰首次问世。此后不到一年时间内,法国、联邦德国、英国、美国、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诸国陆续用十五种文字出版了这部小说。菲尔特里涅利并同意荷兰出版了俄文版。苏联国内报刊从1956年起重新发表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但为避免国内群众知道小说的存在,这些文章只提到作家早期诗歌创作中的缺点。

早在1947年,英国几位作家就曾建议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在现代诗歌创作和翻译西欧古典名著方面有卓越成就的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但瑞典文学院讨论达五次之多都未作出决定。1953年曾以帕斯捷尔纳克是“生活在俄国的俄国作家”为理由否定授奖的可能

性。然而,当《日瓦戈医生》在苏联境外出版后,瑞典文学院立即重新考虑授奖,并通过外交途径听取美苏两方面意见,但最后还是否定了苏联认为授予肖洛霍夫更合适的表示。帕斯捷尔纳克最初得到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通知后,立即欣然复电表示接受和致谢,他写道:“我非常感谢,我感到激动、光荣、惶恐和羞愧。”当时苏联驻瑞典使馆发言人声明,帕斯捷尔纳克作为翻译家比作家更知名。苏联文化部长则表示,须由作家协会讨论是否领奖。但正当苏联政府对《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并被授予奖金一事尚未作出明确决定时,西方政界、文化界及各通讯社、新闻报刊已蜂拥而起,进行了大量政治性宣传,把小说问世称作是“自由俄国之声的重新崛起”,对小说断章取义地作了许多不符实际的解释,正如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指出的那样,他们总是“从七百多页书中仅仅引用那么三页”。此外,西方还大肆宣扬这部“惊人的小说”、“杰作”,“立刻成为畅销书”的盛况。在这一片喧嚣声中,只有少数西方评论家和斯拉夫学者对小说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

1958年10月25日,苏联《文学报》发表《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出击》一文,认为这次向《日瓦戈医生》的作者授奖是西方“一次怀有敌意的政治行动”;该报同时刊出1956年9月《新世界》编委们给作家的那封退稿信。10月26日《真理报》刊文指出,《日瓦戈医生》“恶毒嘲讽社会主义革命、苏联人民和苏联知识分子”,谴责作家“缺乏公民的良心和对人民的责任感”。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宣布,鉴于作家“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以及对苏联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和平与进步的背叛行为”,决定开除他的会籍。在接踵而至的压力下,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29日独自发出另一电报给瑞典文学院:“鉴于我所隶属的社会对这种荣誉的用意所作的解释,我必须拒绝这份已经决定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金。请勿因我自愿拒绝而不快。”这时,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特纳依在庆祝共青团成立四十一周年

大会上讽刺作家说，帕斯捷尔纳克应该离开苏联去“领略资本主义天堂的妙处”，并声称如果作家采取这个行动，苏联政府和人民将鼓掌欢迎。谢米恰特纳依将作家比喻为一头弄脏自己食槽的猪。此时，莫斯科作家也集会建议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国籍。接着，11月1日《文学报》以整版篇幅发表没有读过小说的读者谴责作家及其作品的来信。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开始检讨。11月2日，塔斯社发表帕斯捷尔纳克于10月31日写给赫鲁晓夫的信，11月5日《真理报》又发表作家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在这两封信中，帕斯捷尔纳克声明，他不能离开他生长、生活和工作所在的俄罗斯祖国，他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对他采取极端的措施。他承认他在自己的小说中似乎支持了将十月革命看成不合理、使知识分子遭到毁灭的错误观点。而小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正好给这种解释以口实，所以他拒绝接受奖金。最后，他表示他会找到力量来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同志们的信任。

“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之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苏联境外，出现了《日瓦戈医生》的二十五种以上的外文译文，除俄文版外，有波斯文、希伯来文、阿拉伯文、日文、朝鲜文、印地文等，还有在香港和台湾印行的汉语译本。在西方，这部作品被认为是“关于人类灵魂的纯洁和尊贵的小说”，它的问世被称作“人类文学和道德史上的伟大事件之一”。但是，在苏联，近三十年间，这部小说却只是悄悄流传于民间，也有人曾为它曾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而感到自豪，然而小说始终没有公开出版，舆论界的态度一直是或噤若寒蝉，或全盘否定，加在小说头上的“反革命、反人民、反艺术”的帽子长期没有摘除。可喜的是，1986年6月，在第八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应该及早出版这部作品。

在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中，无论是西方的宣扬，或者是苏联的贬斥，都未能使广大读者很好地理解和正确地评价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名

作。感谢我国翻译家力冈、冀刚同志的辛勤劳作,今天,《日瓦戈医生》终于与中国广大读者见面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部闻名世界的作品呢?我想,首先应该摒弃过去围绕小说所进行的非文学色彩的冷战的影响,而对小说本身及其创作背景进行认真严肃、实事求是的分析。

小说描写了十月革命前后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建设。小说主人公尤利·日瓦戈在他不到四十年的短短人生道路上经历了几乎所有这些复杂、动乱的阶段,他对所有这些历史事件都作出了反应。

日瓦戈自幼丧母,和舅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在一起。舅舅是个哲学家,向往自由和新事物,对日瓦戈的影响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格罗麦科教授家长大、后成为医生的日瓦戈,在沙皇军队供职。他亲眼目睹沙皇的虚弱无能以及旧军队中的腐败现象。他聪颖的心灵预感到革命力量已日益成熟,他期待革命的爆发将使一切事物改观、每个人得到新生。他向护士拉莉萨(后来的情侣)倾吐自己对新生活的向往,他盼望自己能成为这总觉醒的一分子。二月革命的消息将日瓦戈带回莫斯科。在返回故里的路途上,他思潮起伏回荡,形成两股纠缠不清的主流。一股是以妻儿家庭、安宁平静的旧时生活为中心,其中包含对革命的渴望,这是中产阶级所能接受的革命;另一股思潮则是他不熟悉的新东西,包含着战争带来的恐怖、残暴,以及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动摇俄罗斯根基的革命。

在十月革命来临的前夕,困居于莫斯科的日瓦戈一方面冷静地观察到昔日富人生活的不健康,为自己简朴化了的生活感到欣喜和宽慰;另一方面也为革命年代中人们饥馑、困苦的生活所烦扰,对新

生活还存在疑虑。一个大风雪的夜晚，日瓦戈在一处十字路口从一张只印了半面的号外上读到了十月革命的喜讯，“风雪吹打着日瓦戈的眼睛，灰白色的、沙沙响的雪粒子渐渐盖住报上的文字。然而，并不是风雪使他读不下去。此时此刻的伟大和重要，使他十分激动，他一时回不过神来”。日瓦戈并不理解十月革命的真正意义，但出于除旧革新的愿望，他欢呼革命的来临，赞叹说：“多么了不起的手术！巧妙的一刀，一下子就把多少年来发臭的烂疮切除了！”“这是前所未有的事，这是历史的奇迹……”日瓦戈并且以继续留在医院坚守职位的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对革命的拥护。

然而，面临革命后内战时期的严酷现实，日瓦戈逐渐改变了他对新政权看法。俄罗斯大地在内战中遭受的破坏，使他产生了恐惧和失望。他厌恶红军和白匪之间的残酷斗争，他反对一切具体的暴力行为。

新经济政策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开始后，日瓦戈重逢昔日的挚友，后者向他叙述了投身革命后所经受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改造。日瓦戈听后非常反感，他认为他们不善于自由思考，不善于随自己的心意驾驭自己的谈话。他还认为，他们对革命的虔诚只是一种做作和言不由衷。他告诉他们说，在新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和他一样，被迫经常而有系统地过着双重生活，这种生活损害人的健康和神经系统。他自己显然是由于这种双重生活的压力，后来过早地猝然死去。

对于日瓦戈从内心欢迎革命到精神上背离革命的这个转变的原因，帕斯捷尔纳克在小说中作了解释。作家指出，在日瓦戈转变态度的缘由中没有政治成分，没有经济动机，也没有宗教目的。无论在接近或疏远革命的年代里，日瓦戈虽然不断地公开说出自己的各种见解，参与不少议论，甚至被卷进一些政治场合，直到武装斗争，但是，他从来没有过任何独立的政治行为，没有主动参加任何有组织的政

治行动,没有去和那些有政治企图的人交往。他发表的著作也都是历史、哲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正像他对党员干部萨姆杰维亚托夫所说的,政治回答不了任何问题,他对政治没有兴趣。日瓦戈和妻子托妮娅都出身豪门,但日瓦戈对父亲的大笔遗产完全无动于衷。当他被迫去乌拉尔投奔岳母娘家克柳格尔家的总管时,他和岳父的共同心情是:“不是恢复他的家业。”因为“俄国私有制的历史已经结束了”,总之,他对革命没有任何经济要求。至于日瓦戈的宗教信仰,则来自舅舅的影响。而舅舅本人早就是自愿还俗的教士,他所信奉的完全不是世俗的教义,根本没有官方东正教的成分,而是接近俄国宗教空想家尼·尼·费道罗夫倡导的“共同事业”的宗教观,那是一种向往个人自由、具有革命性的宗教哲学。和全书内容有机地联系着的小说最后一章的二十五首诗中,有多首以《新约》为背景,但也都非宗教诗,并不宣传教义信条,而只是借助福音书中的历史、道德观念来阐明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意义和解释小说的主题思想。例如《抹大拉·马利亚》中呈现的是拉莉萨的影子,而《客西马尼园》一诗的结束语显然道出了主人公(亦可以说是作家本人)的心声:所有的时代将接受他的审判。

那么,日瓦戈对革命的态度发生变化的根由究竟是什么呢?他和革命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矛盾呢?这根由、这矛盾存在于他的人生观、宇宙观中间。日瓦戈最早的人生理想来自舅舅关于基督的福音是历史的基础的信念。它的最主要的内容是:维护人格自由、保持个性纯洁、捍卫人的尊严,以及把生命看成一种牺牲过程的人道主义观念。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程应该建立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应该维护这些观念。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观念成为日瓦戈一生中为人的信条和观察世界的准则。

日瓦戈是一个天资很高、博学多才的人。他具有丰富的文史哲学

知识,爱艺术,善作诗,又对自然科学有很大兴趣。他相信一个人应该在实际生活中做些对社会有益的事,因此选择了必须具备巨大牺牲精神的医生这门职业。在向往革命的年代里,他立志要在新时代中忠实地生活下去,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在贫困艰苦的日子里,他充满对别人的怜悯同情之心,他认为只有过着和周围的人相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不是大家共享的快乐不是真正的快乐。在动乱的年代里,他仍坚信人是生活而生的。他将维护人的自由、纯洁、尊严的信念放进了具体的日常生活的温饱观念中,他在自己的日记里以风趣的口吻引用普希金在《奥涅金的旅行》中的诗句来形容自己的人生观:“我现在的理想是有位女主人,/我的愿望是安静,/再加一锅菜汤,锅大就行。”他称赞普希金和契诃夫纯朴的俄罗斯品质,不空唱人类最后目的或人类的解放那类高调。他认为那些高调近乎伪装。普希金与契诃夫安静地过自己的生活,做自己的工作,这些工作日后变得越来越有意义。在日瓦戈心目中,这样的生活模式成为他的人生理想。

然而,革命以后的现实非但没有为日瓦戈提供发挥他的天资、才能的机会,反而摧毁了他的朴实的人生理想。在风起云涌的伟大时代里,日瓦戈变成了一个庸夫俗子型的“小人物”,一个新时代里的“多余人”。不仅在事业上他几乎是无所作为、一事未成,而且在个人私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失败者。他既不是一个忠实的丈夫,也不是一个尽责的父亲,而且无力保护自己心爱的情侣。他但求温饱的最起码的生存条件也几乎难以得到保障。日瓦戈的童稚的心灵,他的超世脱俗的人道主义胸怀,使他始终坚持“只能以善为善”的处世信念。直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所追求的依然是要在社会大变革中独善其身,维护和保卫人的个性自由、纯洁和尊严。他始终用这种理想主义观点看待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日瓦戈和革命时代所产生的矛盾中,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很明

显是站在他的主人公一边的。对于日瓦戈看待革命的态度,对于日瓦戈以基督福音为历史基础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作家是完全同情和肯定的。在帕斯捷尔纳克眼里,日瓦戈所维护的人性自由、纯洁和尊严及人道主义的信念是神圣的、高贵的。这正是作家通过日瓦戈医生这一小说主人公的形象所要表达的主题思想,因而也是这部小说的主旋律。

为了突出日瓦戈形象的意义,强调通过日瓦戈形象所表达的主题思想,作家在小说中还塑造了两个重要人物形象来烘托他的心爱的主人公,这便是拉莉萨·安季波娃和她的丈夫巴沙·安季波夫(即斯特列尔尼科夫)。前者和日瓦戈形象相辅相成,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作为日瓦戈形象的对立面出现的。

拉莉萨和日瓦戈从外在的因素看有许多不同之处,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个人私生活,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拉莉萨和日瓦戈有着许多相同的内在品质。他们的性格、视野、精神、气质都很相近。拉莉萨也具有坚韧的精神力量、内在的心灵美,同样追求个性的自我完善。她以一般少女罕有的毅力,摆脱了使她沉沦的陷阱,依靠自己诚实的劳动,克服了身心的创伤,争取到独立自由的新生活。她强烈地渴望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因而不愿轻易接受恩人的赐予,同时敢于毫无畏惧地去惩罚她的仇人。拉莉萨也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为帮助巴沙,她以自己辛勤挣得的工资为后者抚养双亲,支付膳宿费用,使巴沙得以完成自己的学业。

当时代的巨浪把拉莉萨和日瓦戈冲击到一起,使他们的命运合成一体时,他们品格中的真、善、美,他们两人相同的对于个性解放的追求,就表现得更为鲜明、更为强烈。这一点,在作家对于他们在瓦雷金诺的那段优美的、诗意的、浪漫的、疯狂的、热恋的描写之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拉莉萨的命运和日瓦戈一样,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不

幸遭遇使他们的人生观、宇宙观愈益接近，他们就日益不能为严酷的现实所容。纵然他们逃遁到瓦雷金诺的荒郊僻野，沉醉于隔离尘世的痴梦中，他们追求人性自由和解放的幻想，终究不免被“凄厉的狼嚎”一般严酷的现实所击碎。拉莉萨伏在日瓦戈遗体上所倾吐的那番充满泪水的哀婉的悼词，透彻地揭示了他们和现实的差距。她告诉他说：“生命的谜、死亡的谜，天才的美、质朴的美，这些我们是熟悉的。可是天地间那些琐细的争执，像重新瓜分世界之类，对不起，这完全不是我们的事。”拉莉萨说出了真谛。的确，他们两人的人生理想离现实世界太远了。所以，现实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帕斯捷尔纳克将拉莉萨的形象和日瓦戈的形象并列，并同样给予赞美和褒扬，其目的就在于再次强调小说的主题思想：肯定追求个性完美的正义性。

如果说，在风云变幻的时代里，日瓦戈实际上只是一个可怜的“小人物”，一个可悲的“多余人”，一个消极因素，那么，巴沙·安季波夫正好与他相反。安季波夫一度成为革命中风云一时的人物，一个狂热的积极分子。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是日瓦戈形象的一个对立面。根据作家的剖析，安季波夫的精神、气质均在日瓦戈之下，他并没有很高的禀赋，只不过是庸才。作家在概括这个形象时描述道：“他有两个特点、两种愿望。他思维异常清晰，异常精确。他富有正义感，精神极其高洁，感情炽热而深厚。他想做一个有所开拓的学者，然而他却光有才力，而无足够的魄力，不能用意外的发现去推翻严谨而无益的空泛的预见。”作家指出，从儿童时代起，他心中就充满高傲的志向，以为世界是个广大的竞技场，各人应当在严守规则的前提下追求完美。而当他发现世道并非如此时，他不去反省自己对世界秩序的概念过于浅薄，反而增长了怨恨和野心，妄图做生活和扭曲生活的黑暗力量的裁判者。他失望之余，痛苦至极，寻找革命来武装自己。他投奔红军本是怀着野心和复仇的目的。

安季波夫之所以能够成为革命时代的一个重要人物，不是由于他的天赋和才干，而是由于他克制了自己的天性和人性。他本可免服兵役，但为了避免和妻子间的不自然的关系，他胆怯而又狠心地抛弃妻女，匆匆考入军校。在他成为显赫一时的红军指挥员后，他何尝不怀念自己心爱的妻女，但他的狂妄的优越感和卑微的虚荣心阻止他去看望近在咫尺的亲人。作家通过拉莉萨之口说：“他的面部增添了一种难以捉摸的表情，因而失去了光彩。一张活泼的脸变成了某种思想的化身、原则、模型……我知道这是他所献身的力量造成的。这力量虽然崇高，但却毫无生气而且残酷无情，早晚不会放过他。我觉得他身上已经打上了注定灭亡的标记。”又说：“这都是木头，不是人，只认得什么原则、纪律。”然而，作家笔下的安季波夫又是一个人性尚未彻底泯灭的人物。于是，现实终究没有放过这个内心深处还隐藏着人性火花的人。安季波夫在自己的生命最后结束之前，终于禁不住潜往瓦雷金诺，期望与妻女见上最后一面。获悉拉莉萨和女儿已经永远离去之后，安季波夫仍决心自绝于这容不下个性自由和尊严的世界。

帕斯捷尔纳克对安季波夫这个形象的态度，像这个形象本身一样，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对于作为日瓦戈的对立面的安季波夫，作家显然是持批判谴责态度的。但当安季波夫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真诚地向日瓦戈披露出他内心深处尚未熄灭的善良本质时，作家无疑给予了同情和怜悯。

《日瓦戈医生》是帕斯捷尔纳克用了近十年时间完成的一部长篇小说，是作家一生创作的总结，是作家数十年间对人生、对历史苦心思索的结晶。

帕斯捷尔纳克早期的散文作品中（诗歌当然也不例外，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列举了），已出现过和《日瓦戈医生》在思想主题、人物形

象、故事情节、气氛渲染等各方面十分近似的或甚至相同的片段。例如,《寄自土拉的信》(1918)刻画了一个心灵衰老者的孤独情绪、对失去羞耻的羞耻感、对能温暖心灵的纯洁的渴求,在这一切中已折射出日瓦戈的精神、思想和气质。《柳威尔斯的童年》(1922)中的冉妮娅形象,和《在后方的一个县城》(1938)中冉妮娅成长为伊斯托敏娜的过程,显然都是拉莉萨·安季波娃的雏形。《中篇故事》(1929)中对西伯利亚暴风雪和小村庄的描绘,令人联想到尤梁津和瓦雷金诺。《故事篇章》(1938)中则已出现对格罗麦科家族的介绍,等等。

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作品中孕育着、最后鲜明地出现在《日瓦戈医生》中要求捍卫人的尊严的思想,是和他的个人经历及当时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他个人的命运相当曲折。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诗坛上,他就享有和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不相上下的声誉。1934年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他被布哈林称为“当代诗歌的巨匠”。而与此同时,他的创作却始终受到贬多于褒、毁过于誉的评论。这情形促使他埋头翻译,匿声诗坛达十年之久。他虽有幸未在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的肃反运动中罹难,但在1946年整顿文艺界的运动中几乎成为阿赫玛托娃和左琴科之后的第三名批判对象。他自身的经历已足以使他产生对时代生活保持一种相对独立的精神,以旁观、远察、静思的眼光去考察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此外,数十年间,帕斯捷尔纳克在文学界的许多挚友遭到不幸: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过早地悲剧性地死去,亚什维里和曼德尔什坦姆相继消失,茨维塔耶娃被迫自尽于边远的小城镇,1948年后成为帕斯捷尔纳克文学事业的助手、也是他生平最后十多年中形影不离的情侣伊文斯卡雅被逮捕监禁……所有这些悲惨事件都在作家心中引起久远的悲哀和深沉的痛苦。他甚至因为自己是朋辈中的幸存者而深感内疚。他曾尽力照顾这些人的亲属,给予他们精神上的支持和